

# 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

〔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64

编 陈永发 陈永发 陈永发 编



# 法 国 对 外 政 策

1944—1984

〔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 著

陆伯源 穆 文 等 译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

**Alfred Grosser**  
**AFFAIRES EXTÉRIEURES**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1944—1984**  
**Flammarion, 1984**  
根据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王小明

**法 国 对 外 政 策**  
**1944—1984**

〔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 著  
陆伯源 穆 文 等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0.375 字数：262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76-1/D·40 定价：4.00元

##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阐述1944—1984年法国对外政策的专著。作者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是知名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本书是他的力作，曾获1985年阿道尔夫·本丁克奖。作者在书中回顾了现代法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勾划了它的基本轮廓，展示了它的发展方向。这对于读者了解和研究法国对外关系史无疑是极有助益的，对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戴高乐将军对现代法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赋予法国对外政策的独立精神，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一点在书中有着突出的反映。

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取材和立论方面，因受其立场的局限而有所偏颇，特别在对战后出现的冷战形势、朝鲜战争、前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等问题的观点上，存在着不少缺陷和谬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与鉴别。

参加本书翻译的同志，依译文先后分别为陆伯源、穆文、董心礼、罗丽鹏、吴泽献、姚海星和杨小茸；陆伯源和穆文对全书作了校对。限于译者水平，书中错讹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88年6月

# 目 录

|                                         |     |
|-----------------------------------------|-----|
| 导 言 .....                               | 1   |
| 第一部分：软弱而富有创造性的第四共和国                     |     |
| 一、解放初期 .....                            | 10  |
| ——合法性 .....                             | 10  |
| ——同（法国）共产党联合和同苏联结盟 .....                | 15  |
| ——列位于大国之间 .....                         | 19  |
| ——戴高乐将军的离职和优先重视德国问题 .....               | 24  |
| ——从帝国到法兰西联盟 .....                       | 32  |
| 二、1947年：影响深远的转折 .....                   | 42  |
| ——德国问题和马歇尔计划 .....                      | 42  |
|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领导下的法共 .....                | 48  |
| ——以色列的诞生。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摩洛哥，<br>阿尔及利亚 ..... | 55  |
| 三、联盟、欧洲及海外的悲剧 .....                     | 66  |
| ——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 .....                       | 66  |
| ——舒曼计划中的欧洲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欧洲 .....             | 74  |
| ——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危机、印度支那战争 .....               | 84  |
| 四、1954年：孟戴斯—弗朗斯年 .....                  | 93  |
| ——在印度支那实现什么样的和平？ .....                  | 94  |
| ——从欧洲防务共同体到巴黎协定 .....                   | 101 |
| ——从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 .....                      | 109 |
| 五、欧洲、阿尔及利亚和一个共和国的结束 .....               | 114 |
| ——迈向共同市场 .....                          | 114 |
| ——北非各国的独立和黑非洲的演变 .....                  | 120 |

|                                |            |
|--------------------------------|------------|
| ——苏伊士运河事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僵持 .....      | 127        |
| ——共和国的苦恼和武器 .....              | 135        |
| <b>第二部分：历届总统的政策</b>            |            |
| 六、戴高乐、阿尔及利亚和非洲 .....           | 141        |
| ——从一个共和国到另一个共和国 .....          | 141        |
| ——戴高乐将军的观念 .....               | 149        |
| ——阿尔及利亚，又一个四年 .....            | 156        |
| ——非洲的独立与依赖 .....               | 168        |
| 七、雄心与失败 .....                  | 175        |
| ——法德联姻？ .....                  | 177        |
| ——欧洲的矛盾 .....                  | 183        |
| ——原子弹、北约和苏联 .....              | 190        |
| ——美国的疑虑 .....                  | 205        |
| ——《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            | 216        |
| 八、乔治·蓬皮杜：通向危机的转折 .....         | 228        |
| ——压倒一切的货币问题 .....              | 230        |
| ——联希思反勃兰特？ .....               | 235        |
| ——赎罪日战争和对石油的依赖 .....           | 245        |
| 九、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所有人的朋友吗？ ..... | 252        |
| ——两种风格 .....                   | 252        |
| ——南北问题 .....                   | 258        |
| ——在西方国家之间 .....                | 269        |
| ——“芬兰化”？ .....                 | 280        |
| 十、弗朗索瓦·密特朗：无可选择的更替？ .....      | 286        |
| ——总统、总统的党和与共产党的联盟 .....        | 286        |
| ——从坎昆到乍得，从耶路撒冷到贝鲁特 .....       | 294        |
| ——没有防务的欧洲 .....                | 300        |
| ——经济束缚与美国的启示 .....             | 308        |
| <b>结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 .....</b>    | <b>315</b> |

## 导 言

“对于盟国承认法国政府一事，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的印象？——我可以告诉你们，政府对于人们总算愿意直呼其名是感到满意的。”

在1944年10月2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将军就是这样嘲讽盟国在前天的来照中作出的决定的：苏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承认戴高乐政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这是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早在6月2日在阿尔及尔就已采用的名称。但这一外交行动仍不失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使它有权以法兰西的名义讲话，在世界上推行法兰西的对外政策。

总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全面代表资格究竟应追溯到哪一个确切的日期并不重要。从6月解放巴耶<sup>①</sup>的欢呼声算起，从维希（政权）的彻底崩溃算起或从8月在香港丽舍大街的胜利游行算起，还是从9月2日把政府设在巴黎之时算起，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此之前，由于政府经过了改组，并且囊括了国内抵抗运动的首领，因此政府业已牢牢控制了国家机器。重要的是以解放为契机来开始我们的主题。因为它同戴高乐将军个人是无法分开的，而解放也并不是从战争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尽管发生了1981年的更迭，当轮到第五共和国的第四位总统来继承戴高乐的遗产时，夏尔·戴高乐其人及其个人的品格对解放以来40年的对外政策的影响看来始终是明显的。但却也不能因

---

① 巴耶系盟军1944年6月解放的第一座法国城市，位于诺曼底省。——译者



此而过高估计了他的作用，同样也不能过低估计了他的态度的变迁，更不能总是以他为依据来判定各种人物、各种力量、各种局势和各种决策。当然，人们也可以把弗朗索瓦·密特朗先后看作是戴高乐将军的部长，不断遭到戴高乐将军抨击的共和国的部长，戴高乐总统的一贯的反对派，最后也可以把他看作是在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上同戴高乐将军相似的继承者：瞧，人们对于现实的简化和歪曲竟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们的主题是从1944年开始的，而不是从1945年5月8日开始的：这首先是为了不要忘记，最初的方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就已确定的，而且其中有些方针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才得以制定的。但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从一开始就突出法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说，在5月8日前是战争，那么，在5月8日之后，就有了和平吗？不管结束这场大屠杀的意义如何，然而不应忘记，德国投降之日，法国并没有最终摆脱这场悲剧。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同一天，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地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更主要的是因为除了两次短暂的间歇外，法国对外政策在历时17年之后才摆脱了任何悲剧性问题的羁绊。第一次间歇持续了不到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即从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至1946年11月23日法国海军轰炸海防和1946年12月19日越盟进攻河内为止。第二次间歇时间更短：1954年7月20日结束印支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签字三个半月之后，即11月1日就爆发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若说我国历史上的这一段时期是从193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62年结束，那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为了理解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困难，应当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所带来的变化。只是在1962年之后，法国的对外政策才不再与流血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不是为法国的负责人提供了行动自由的话，那也至少使他们摆脱了一种烦恼。

这里说的是对外政策，而不是外交政策。第一种提法也许比

第二种提法更好，其理由有三：1944年的（法兰西）帝国，1946年的法兰西联盟，1958年的（法兰西）共同体曾经是，或者曾经被假定为比法兰西共和国更为广泛的群体，它们虽然是在法国的外部，但对法国来说并不是外国。印支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有时发生的流血冲突，前法属赤道非洲和法属西非时断时续的演变都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愿失掉构成法国本土以外的现实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话，而这正是政治家和政治力量必须应付的现实。

正当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保护国和海外省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并在原则上进入习惯上属于国与国之间的政策范畴时，在我们欧洲大陆上却渐渐地出现了另一种独特的现实。因此，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第一任总理1974年7月5日在国民议会里的首次讲话中才能这样说：“欧洲政策已不再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欧洲政策是另一码事，它同我们为本国制定的基本计划不可能再截然分开了。”希拉克这样说，当然不是想表示要建立一个取消各国民族政策的欧洲。然而，他强调了的欧洲的特性，这终究同互不相关的国家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是很不相同的。若用外交政策的概念来套欧洲政策，无异于忽视了（欧洲）群体确实蕴含的共同体因素；当然，把群体称作共同体多少有点矫揉造作，并且为时过早。

最后一点，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使用“外国的”这个形容词会产生极大的不便，似乎使人觉得存在着两个截然割裂的方面，而对内和对外却是不断地交织在一起的。政府对内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而对外政策正是要力争对这种国际环境有所影响。国内力量的消长变化，社会状况和公共财政状况均影响着对外政策，影响着它的方向和能力。有时，政治家则根据自己的看法来确定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截至1946年1月20日，之后又从1958年6月至1969年4月，作为执政者的戴高乐将军认为，内部发展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而对

外政策本身则是实现最高目标，即民族抱负的工具。即使是最关心经济繁荣和社会变革的各届政府，亦受到了外部的约束，以致于不得不把对外政策置于它们优先考虑的中心地位。

从1947年起，第四共和国是遭到悲剧打击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在内部冲突方面同时经历了战后世界的两大磨难，即东西方对抗和非殖民化。英国虽有殖民地，但没有举足轻重的共产党；意大利虽有强大的共产党，但它的殖民地早在1945年就被剥夺了，在这个时期的开初阶段，即1947年11月，冷战初起，内战的威胁随之而来；在这一时期的末尾，即1962年，为了暂时延缓阿尔及利亚的演变进程——它将导致欧洲在亚非的整个领地走向独立——秘密军队组织进行着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

即使没有悲剧和磨难，内外因素在经济方面也是始终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如果美国不给欧洲人提供大规模的援助，那么1945年12月成立的现代化装备计划总署就无法顺利完成其任务。1/4世纪之后，美国于1971年8月15日决定取消美元的可兑换性。这一决定早在石油价格增长三倍的前两年就已表明了内部繁荣对外部的影响和限度。由于欧洲（货币）体系的存在，国际货币体系混乱的有害影响受到了遏制，尽管它本身也开始对各国的经济政策起着抑制作用。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只是到了1983年3月才完全理解这种抑制作用，换言之，亦即国际环境，尤其是欧洲环境对于法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

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对外政策，因此，我们的研究几乎不涉及外界对内部事务的影响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花的篇幅甚至比在《西方人面对跨国现象》一书中所花的篇幅还要少。所谓跨国现象，即是指好几个国家几乎同时发生的潮流。然而这些潮流并不是根据某种政治意志，特别是政府的意志而制造出来的。1945年左翼势力的增长是这样，60年代后半期不满现状的风潮是这样，80年代初期，大西洋两岸反核和平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

相反，人们怎能忽视决定对外政策的主要的内部因素呢？的

确，不管外界的压力多大，1973年米歇尔·若贝尔作为外交部长在国民议会的首次讲话中提出的观点是很过份的：

任何政府，无论是本届政府或别的政府，在制定和推行它的行动时，总是处在同样的迫不得已的窘境面前，面临着同样的障碍，并且也总是被迫采取同样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不存在某一项对外政策是这一个政府所特有的政策，好象另一个政府又会有它自己的对外政策一样。

若贝尔本人却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批评其他领导人，并且让人相信，他的政策是与众不同的！行动更是由思想和观点来确定的，而思想和观点在受约束的环境中总是倾向于按这种方式而不是按那种方式前进的。往往作出某种抉择的显著原因是因为集体毫不怀疑地相信这种抉择。全国抵抗委员会<sup>①</sup>的行动纲领在全国国土解放之时为政府规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恢复法国的强大力量、崇高威望和世界使命”。请问，有哪一位政治家，有哪一个法国政党曾经敢于、并且今天还敢于否认这样一种提法呢？读者只需把“法国”换成“西班牙”或“德国”就能发现，这一提法并不一定是普遍适用的，它并不一定反映一个民族集团的集体意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有法国和英国几乎一直想回答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如何才能恢复我的世界性影响？尽管我知道，实际上我已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了。”对于以往的世界作用的缅怀可能产生某些行动或给人留下苦涩的回味。这种对往昔的留恋也反映在对威望的强烈追求上，以致于追求这种威望并不是将它视作一种能更好地实现具体目标的手段，而是被看作

---

<sup>①</sup> 全国抵抗委员会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抗德地下斗争的全国性组织，进步力量曾在其中占有主要地位。——译者

目的本身。但法国的对外政策并不因此就一味地只追求威望而从不考虑具体地改变世界秩序。然而，对于闪光的东西的癖好（言辞的华美或由言辞产生的光彩）往往掩盖了一件重要的事实。

是的，由一个人代表的政权有可能导致改造的行动，但它并不一定就能把这种行动进行下去。而某种受到蔑视的政治制度，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作为的，其政府有时却能取得对外政策上的最高成就，即承受外部的压力，同时把这种压力转变成创造性的革新行动。1950年5月9日，罗贝尔·舒曼在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他虽不得不给予新生的德国以平等权，但同时却给这种别具一格的结构以决定性的推动。当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1954年7月31日对突尼斯贝伊<sup>①</sup>发表谈话时，他一面接受了时局的变化，同时又通过谈判把对抗转化为和平演变。1956年的德费尔法承认改变非洲国家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亦为非冲突性的变化开辟了道路。法国日后从中获得了好处。

的确，屈服于压力，即使是为了改变这种压力，也往往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意志。而顶住压力，有时却能改变产生压力的现实。1940年，贝当投降了，戴高乐则拒绝投降。在什么时候，放弃（意志）是现实主义的？又是什么时候，不顾实际情况进行意志游戏就会是一种导致失败的幻想？显然，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答案是根本不存在的。然而，在我们所要研究的40年的历程中，有着极不相同的形势，对外政策的参与者们却以同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度极不相称的观念来应付这种形势。

执政者、政党、工会和各种利益集团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得出观点：束缚他们思想的最重要的现实之一，就是他们对于必须作出反应的事实看法。在事前，他们已经或个别地，或集体地有了一整套准备接受这些现实并粉饰这些现实的说辞，

---

① 贝伊系亚非某些国家使用的称谓。1705—1957年用于突尼斯统治者的称号。

——编者

同时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强调这些事实。由于所受的教育、经验和通过阅读报纸、收听电台和观看电视所作的新闻选择不同，他们对于新的事实、新的形势的认识都是经过过滤、戴着有色眼镜获得的，所以他们对于事件的理解和粉饰就不同于他们的邻居，即邻国或邻近的党派。必须高度重视参与者们是如何看待“客观”现实的。因此，我们不能总是以今天的认识来衡量他们。分析1944年以后殖民地冲突的起因，这首先要理解法国的教化使命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提法——可当时曾有人这样虚伪地认为，而今天，歪曲事实的哈哈镜却常常要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殖民化是不折不扣的残暴和剥削。

参与者们的亲身经历可以从一个例子中看出其重要性。说真的，这个例子也是太重要了。解放时掌权的那一代人遭受过慕尼黑耻辱的打击。在战争结束时，即使那些曾欢呼过达拉第为了“拯救和平”而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也自认为，1938年9月30日协定一签字，他们就感到忿忿不平。这样，慕尼黑就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参照物。1956年，苏伊士战争是法国和英国出于多种原因而共同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居伊·摩勒和安托尼·艾登不愿因向纳赛尔让步而再次制造一个“新慕尼黑”。在此之后没有几年，乔治·皮杜尔却援引慕尼黑的先例来反对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任何变革，因为民族解放阵线在他看来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而早在1935年，他就在《黎明》报上反对对希特勒的放纵政策。戴高乐将军之所以重视原子武器，慕尼黑在其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8年，我们在外交上已经投降了，诚然，我们可以对希特勒说：“如果你们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在马奇诺防线后面进行胜利的自卫，”但我们不会说：“如果你们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我们就进攻你们。”因为谁都知道，法国军队只是根据防御的需要而组建起来的。没有进攻性的武器，也就没有应付危机的外交能力：这些进攻性武器，在1938年是坦克军团；而在60年代将是（核）打击力

量。最后，当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3年1月20日向（西德）联邦议会讲话时，他为加强西方的核潜力辩护。可德国人并不明白，对于法国总统来说，他所依据的历史，并不象德国人那样是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以及1945年由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是1938年由于缺乏意志和军备，人们投降了。这不仅没有保障和平，反而招致了战争和1940年的灾难。

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回顾和援引慕尼黑，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行动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对往事的反省。从解放之初开始，法国共产党就认为，把反对慕尼黑作为抵抗希特勒的标准是利可图的。因为，法国共产党是政治上彻底反对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唯一组织。一再重提这一事实，不但可使它自己，而且还可使别人对1939年8月希特勒—斯大林条约<sup>①</sup>至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这一段不很光彩的时期保持缄默。运用经过精心选择的过去的情况是一种极好的政治武器，一旦有机会，那是人人都想使用的，那怕只是为了制造有利的政治形象或者使这种形象更加美好也罢。所以，当戴高乐将军1944年6月14日祝贺巴耶人民、称赞他们是集体的抵抗战士时，他应该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一地区，英雄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地并不比法国其他地方来得高。但是，让绝大多数法国人同抵抗运动联系在一起，总是好事，即使这样做美化了他们在占领时期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关系。

慕尼黑协定是与马奇诺防线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倒不假。但是，马奇诺防线的战略并不是由于偶然，或仅仅由于人们的软弱，或者还是由于人们缺乏预见性的结果。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对于安全的忧虑和需要自我保护的感受也是，甚至尤其是人口大大下降这一事实造成的。人口大量下降主要是（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口过度损失的结果。至少，如果人们不参观几座村子里的烈士纪念碑和看一下刻在上面的一长

---

<sup>①</sup> 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

串名单，那人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法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内外政策。但，是否因此就原则上需要依靠人口理论来解释对外政策呢？那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如社会关系的性质，工业发展的状况，经济权力的分配等。

当然，有时候，我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指出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对于对外政策的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重要性。但要对政府似乎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态度作出解释，我承认，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尽管这些决定和态度是处在现实的中心位置，并且客观上被假定是可以分析的。一般来说，我仅限于比较肤浅的分析，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发现某一环节中那些真正值得指出的重点，要想提出在复杂形势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要想理解那些指导法国对外政策的人和集团的动机——它们往往是各色各样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的确，要理解他们的动机，需要在客观性上付出艰巨的努力。这倒不是因为人们永远不能做到客观的缘故，而是因为每个人的独立判断和分析能力总是受到从童稚时期起就积累起来的先入为主的想法的局限。但，是否力求做到客观，两者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别。力求客观，就要不断地自我抑制，以免个人的好恶过多地影响分析。这样也才能友善地对待那些自己感到疏远的人，而对那些自己感到亲近的人，永远保持一种批判精神。为了不使自己走入歧途，有一条预防措施：允许每个人怀疑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尽可能地尊重他，只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可蔑视他。因此，永远不要把批评和嘲讽混同在一起，千万不要借口不甚了然的科学性而影响自己对受害者表示怜悯或对成就表示钦佩。大至人类历史，小至法国历史，对外政策当然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领域。



## 第一部分

# 软弱而富有创造性的第四共和国

### 一

## 解放初期

在1944年9月，一切看来都是简单的。在外部，为对付共同敌人而战的各国配合默契，由于法国的支持而得到加强的苏联、美国 and 英国正向希特勒德国采取钳形攻势；在国内，反对占领者的各个派别都参加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政府，比如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就是全国抵抗委员会的领导人——让·姆兰的继承人。所以，走向胜利的盟国是团结一致的，战胜了投敌的维希政权的各个（抵抗）运动和各个党派也是团结的。但是，无论是盟国的团结，还是国内的团结，都不是毫无困难的，尤其因为国内的紧张局势是同外界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 合法性

维希政权曾经被看作是根本没有存在过或至少被看作是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一旦战争结束和被俘人员从德国回来之后，法国人民将决定是否要继续1875年的共和国的进程，或者是否应当创建第四共和国。然而，贝当元帅的政府至少在国际上是享有合法地位的，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政府都承认它是他们的对话者，因为它在法国行使并保障了国家的权力。只是在纳粹德